



后唐明宗为何饮恨而终

一个缺乏政治、历史知识的人，是很难有知人论世的能力的。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在位时间较长的一位君主。但他“仁而不明”，昧于识人，不辨忠奸、优劣。在外管不好军队，在家又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，他在李从荣之乱平息后含恨而亡

王春南

他想把国家治理好

后唐明宗李嗣源是沙陀部人。因战功升至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。公元926年，后唐庄宗为叛乱的士兵所杀，李嗣源入洛阳，被推戴为监国。随后以“旁支入继皇位”（他是庄宗李存勖之父李克用的养子）的名义继位。

这位皇帝“目不知书”，又缺乏起码的文史知识，讨论“国号”时，连“国号”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，此人自有其长处，史书说他“为人纯质，宽仁爱人”，又说“质厚寡言”，大概是说他为人厚道，说得少，做得多。他想把国家治理好，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。

李嗣源称监国以后，能吸取庄宗“骄淫无政”、开国后三年败亡的教训，努力做到清心寡欲。掌管宫中事务的官员为讨好他，特地从庄宗留下的1000多名宫女中，挑选出几百名年少美貌的宫女献上，遭到了他的拒绝。他说：要这些人干什么？宫中用的人要懂得先例和规矩，这些人懂得什么？年少的宫女他一个不收，全部放回民间，留下的全是“老旧之人”。

他下令对宫中人员大加裁减：宫女留100人，宦官留30人，教坊100人，鹰坊20人，御厨50人。宫中机构有名无实的统统裁撤，节省了很多开支。

他痛恨对百姓横征暴敛的虎狼官员。在庄宗时，负责赋税征收的孔谦奸邪谄媚，刻剥穷困军民。他下令公布其罪状，并将其斩首，以儆效

尤。凡孔谦所立苛刻之法，一概废弃。

他痛恨贪赃不法的官吏，称他们为“民之蠹”，一经发现，严惩不贷。同时表彰廉洁的官员。

后唐庄宗时，百姓的赋税负担特别沉重，夏、秋二税每一斗还要加征一升所谓“省耗”（“蚀耗”）。明宗时规定：今后只收正税，不额外收“省耗”。百姓负担有所减轻。

明宗时时记挂着农民的生活。曾与冯道谈到农村的丰收。冯道说：我常记得从前在先帝（庄宗）幕府，奉命出使中山，从太原到井陘，道路险阻，我生怕坐骑跌倒，手拉缰绳特别小心。及至平坦之路，我放松了缰绳，很快就跌下马来。治理国家也是如此。明宗认为他说得很对，于是问冯道：今年丰收了，不知百姓生活是否富足？冯道回答说：农民荒年则饿死，丰年则谷贱伤农。丰歉都受害的，只有农民。聂夷中诗云：“二月卖新丝，五月卖新谷。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”士农工商，四民之中，农民最为勤苦，国君不可不知也。明宗很重视冯道这番话，还命人将聂夷中的诗抄下，经常学习、诵读。

明宗提拔“忧公如家”、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能臣任圜为宰相，主管经济、财政。任圜没有辜负明宗的期望，把经济、财政管理得很有条理。一年后，成效显著，“府库充实，军民皆足，朝纲粗立”。

对于明宗的治国，《新五代史》有这样一番评论：明宗是真心治理好国家的。他即位时，年岁已高（60岁），能不近声色，不喜好出游打猎。在

位时,“兵革粗息,年屡丰登,生民实赖以休息”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说,明宗时,“年谷屡丰,兵革罕用,校(比较)于五代,粗为小康。”

他没能使后唐长治久安

明宗从庄宗手里接下的,是一付烂摊子。社会动荡不安,百姓居无宁日。“当时天下皆骄兵”,军人动辄闹事。派他们镇守远方,他们不乐意,就要作乱。安抚军队成了头等大事。

明宗对叛乱的军人,绝不姑息,必以严酷的手段加以处置。即位以后,先后发生了汴州兵变、滑州兵变、芦台兵变。每次兵变发生,不但叛乱的军人均遭杀戮,而且其在营家属及全家都被杀死。杀人之多,动辄上万,那场面非常惨烈。但乱兵是杀不完的。诛杀乱兵,兵仍乱。

另一方面,明宗吸取了庄宗苛待军士,导致军队离心乃至反叛的教训,一再迁就军士,提高他们的待遇,希望以此安抚军心。明宗厚待军士,到了不顾财力的地步,以致出现了财政窘迫的局面。但事与愿违,“给之愈滥,士心愈骄”。

对军队,无论是硬的一手,还是软的一手,打的一手,还是拉的一手,都没有掌握好政策,把握好“度”。宽严、恩威失当,必然适得其反,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,想压军队而压不住,想拉军队而拉不动。军队问题始终没处理好,故后唐很难安定。

明宗毕竟只会打仗,没有文化,缺乏政治、历史知识;而一个缺乏政治、历史知识的人,是很难有知人论世的能力的。史书说他“仁而不明”,指的就

是昧于识人,对社会上、官场上的各色人等往往缺乏鉴别力、洞察力。他宠信不该信用的安重诲,而对真正值得信用的任圜,始则信,继则疑,后则杀。

安重诲倚仗明宗对他的宠信,特别骄横。明宗的侍卫官马延不小心冲撞了他的仪仗队,他当即将马延杀死。明宗没有给予他任何处分。安重诲倔强固执。有一次,明宗交代他,选择一处重镇,委派华温琪去当节度使。他回答说,节度使的位置不缺。明宗多次提起此事,安重诲不耐烦地说:我几次上奏,节度使不缺,只有我担任的枢密使的职位可以让他代理。明宗说:那也好。安重诲敢于跟明宗赌气,明宗一时也奈何他不得。

任圜治国成绩有目共睹,然而明宗仅仅因为听了宫女随口说的一番话,就对他产生猜忌。一次,任圜为户部与枢密院的权限划分问题跟安重诲争论于明宗之前,任、安二都声色俱厉。退朝后,一位老宫女问明宗:刚才跟安重诲争论的是谁?明宗说:宰相。宫女说:唐代时,我在宫中,从未见过宰相、枢密使奏事,敢于这样。他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。从此以后,明宗便不满于任圜。很快任圜被罢相。四个月后,安重诲奏准明宗,“赐死”任圜。史书说,“明宗起于行伍而为天子,常疑宰相轻己”。这位行伍出身、没有文化的皇帝,常常怀疑有文化的宰相看不起自己,对他们的一言一行特别敏感。任圜与安重诲在他面前的一番激烈争执,竟然引来了任圜的杀身之祸。明宗只疑忌任圜,而不怀疑安重诲看轻自己,是因为安重诲比文盲强不了多少,虽然能读奏章,但不解其意。

明宗晚年,有个名叫康澄的官员在上书中提出了五个“不足惧”,六个“深可畏”。大意是说,天气反常、自然灾害、流言蜚语等等,都不可怕;而贤人归隐山林不出来做官,士农工商不能安于自己的职业,人无廉耻道德沦丧,诽谤乱真是非颠倒,皇上听不到忠直之言,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康澄的上书切中时病,明宗虽然嘉奖了他,但对他的意见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。再说,那时离明宗病故已不远,就是他想改弦易辙,也失之过晚、力不从心了。

明宗在外管不好军队,在家里管不好儿子。次子李从荣,是一名无赖、恶少。此人年少骄狠,轻佻峻急,骄纵不法。明宗不会不了解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,但居然让他带兵,把他的位置排在宰相们的前面。宰相们害怕冒犯这位皇子,招致杀身之祸,纷纷提出辞呈。

公元933年,即位后的第八个年头,明宗病危。李从荣带兵入宫谋夺皇位。明宗闻讯,无奈地说:从荣何苦如此!又说:我早就知道这帮人不足以托付大事。从荣之乱很快被讨平,但明宗受了惊吓,病情转重,旋即去世。临死前对冯道等大臣说:我家里的事闹到这地步,没有脸见你们。

明宗留给儿子的,是基础不稳的政权。继位的三子李从厚又“宽柔少断”,应付不了复杂、动荡的局面。不久,明宗的义子李从珂继位。李从厚和李从珂,两人在位的时间总共才三年。936年,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借助契丹兵力,灭了后唐,建立了后晋。

人民文摘